

SIXIANGYUSHESHEHUIYICONG

丛书主编 ◎ 杨生平 汪宇



(美) 凡·戈斯 ◎ 著

侯艳 李燕 ◎ 译

反思新左派

——一部阐释性的历史

fansi xinzuopai

新左派运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被西方称为20世纪以后影响西方社会及至全球社会发展的三种重要意识形态。本套译丛的立意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之上，从西方学术著作中选择一批有影响并立论较为客观的著名学者的相关论著，集中翻译成系列。这些译著不只立足上述三方面，而且还挖掘了与它们相关的思想理论。另外，本套译丛还介绍了一些不同国家政治运动比较方面的著作，以及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知识分子的状况。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SIXIANGYUSHEHUIYICONG



丛书主编 ◎ 杨生平 汪宇

反思新左派

——
一部阐释性的历史

(美) 凡·戈斯◎著 侯艳 李燕◎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思新左派:一部阐释性的历史/(美)戈斯著;侯艳,李燕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656-0876-6

I. ①反… II. ①戈… ②侯… ③李… III. ①新左派—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8546 号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St. Martin's Press, LLC,
under the title Rethinking the New Left by Van Gosse.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2-158546

思想与社会译丛

FANSI XI ZUOPAI

反思新左派

——一部阐释性的历史
(美)凡·戈斯 著 侯艳 李燕 译



项目统筹:来晓宇

责任编辑:彦虹

责任校对:李佳艺

责任设计:王征发

责任印制:何景贤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编 100048

电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35 千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前 言

英国学者柯林伍德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是从深层次把握社会发展的，因而它更能凸显历史事件的意义，也更能助推社会发展。当然，思想并不能单独决定历史发展，思想史也不能代替现实史，思想亦来自于社会与生活，只有那些深刻揭示历史本质与历史规律的思想学说才能生动展现历史现实并持久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现实是思想的活水源头，任何思想必须以自身的形式体现并反映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一种思想的兴衰实际上是特定社会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一个社会，不管是把握其生活还是把握其思想都是不够的，只有全面了解社会生活与思想并在它们的互动中才能把握其全貌。西方社会历来不缺少思想和思想家，自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西方陆续出现了像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新托马斯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众多流派。这些思想和流派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为了较客观地展示当代西方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景象，《思想与社会译丛》的编者从浩如烟海的西方思想史著述中，精心挑选了一批对当代西方有重要影响或较好反映当代西方社会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著作。这里既有新左派思想，也有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思想；既有不同思想的交锋与博弈，也有同一思想或流派的流变与发展。如此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读者尽量在多层次、多方位比较中充分、客观又较为全面地了解西方社会，并以此为基础探寻其实质。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在西方没有变成现实，但它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却不能低估。了解西方社会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必须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所有地球上的居民，今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了巨大进步，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国力明显提升，国际影响力稳步增强，但与此相比，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却相对较缓。当有记者问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中国能不能强大，中国能不能构成对世界的威胁”时，撒切尔夫人答道：“中国是否强大是能否构成对世界威胁的前提。那么中国能不能强大呢？我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使用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甚至思维方式都是西方的。连理论研究都是在西方的结论基础上进行的，这些结论来自剑桥、哈佛等著名的大学，也有著名的研究机构。我不否认这些新思想、新概念以及新思维的正确性。但是，它是为西方价值观服务的。试想，一个只能步他人后尘的国家能够强大吗？至于对世界的威胁，那更是不可思议的。”撒切尔夫人的回答自然是明显带有西方政客对中国发展的偏见，但细细想来，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不是十分相称的现状。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识不到问题的存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只有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植根于中国制度，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创新，才可能做到、做好。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之上，只有充分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引领中国发展并影响世界的，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此，《思想与社会译丛》既可以起到了解、借鉴和启示作用，又可以起到批判、继承和吸收作用。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套丛书的意义，我们特意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所在这方面颇有造诣的青年学者蒋洪生为丛书作序。

杨生平

2014年12月

总 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克罗齐如是说。克罗齐这么说的缘由，或是基于以下几点：其一，所有的历史，包括去日不远者在内，皆是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写就的，总是后事件性的(post-evental)。去日如流，不止不息；历史永不能重演，时光断不可倒流，故而一切历史，从认识论意义上说，总是事后在人们的脑海之中被重新构建过的一种当下呈现。其二，有可见的历史，有不可见的历史；相比不可见的历史，可见的历史只是恒河一沙、沧海一粟。我们于今可见的一切历史，也是史家根据其不同的史学兴趣，根据时代和现实所赋予他们的“问题意识”，根据种种主体性的“史家之眼”，来对无边的历史进行甄别、遴选、命名、分类和铭写的结果。史学兴趣也好，“问题意识”也好，“史家之眼”也好，可以说都是当下性/当代性的，即史家总是以当下/当代的期待视野来书写过去的。其三，自历史的终端用户即史学的阅读者、研究者和借鉴者而言，选择、阅读、研究和借鉴何种历史，虽然不排除有“智识”训练之成分在，大抵也是为其所处的时代和现实所驱动的。他们都是带着当代人的欲望、意识和眼光来选择历史、阅读历史、观照历史和借鉴历史的。一段历史如果完全不受时人的关注，那么即使这段历史铭写在案，勒石成碑，对当代人而言，它也不成其为有意义的历史，也免不了湮没尘埃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克罗齐的这一著名论断暗示着我们，历史的书写者和研习者追索的与其说是历史之历史性(historicity)，不如说是历史之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

自现代性在人类历史上生根破土以来，历史在加速度地前进，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可谓不可胜数，其中有的备载史册，有的则“族繁不及备载”，被人们忽视或遗忘；即便已被载入史册的，其重要性于今人而言，也自各有不同。一些历史事件被今人视为重大事件，而另外一些事件，则基本上已经湮没于荒冢衰草之间。那么，对时人而言，历史事件的重要与否，其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何在呢？人们截取历史的片段，是否完全是主观随性，而没有客观性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呢？恐怕也不是这样。

选取还是不选取某个历史事件，放大还是不放大某个历史片段，往往与特定事件中是否蕴含着丰富的当代性因素、是否能够明晰地透视或折射今人所处的诸种矛盾关系密切相关。事件本身意味着矛盾，意味着断裂，意味着连续性中的非连续性。历史事件的发生，不外是各种矛盾相互角力的结果。地壳的板块运动和碰撞会造成地震；社会的种种矛盾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同样也会造成类似的断裂性事件。在大的社会性地震之后，某些矛盾可能能够得到历史性的解决，但是从现代社会发展的情势来看，在更多的时候，很多矛盾往往只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或缓解，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矛盾会以变异的形态，以潜流或地火的方式暂时地蛰伏起来。而原初事件中的矛盾关系越是在当代以变异的形态顽强地持存，那么，这些历史事件中所蕴含的当代性因素就可能更强，也更易受到今人的关注，从而被今人赋予更大的重要性。

现代性以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伴随着深刻的思想史事件，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序幕和前奏。以欧洲来说，没有启蒙运动的勃兴，或许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没有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很难想象会有巴黎公社的建立；没有毛泽东主义的跨国输出，1968年席卷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是后来的样态。以中国而言，没有民族国家理念和民族主义思想的自西徂东，何来辛亥革命？没有打倒孔家店，何来建立新中国？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唯生产力论的论争，何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而没有深刻的思想史事件相伴的历史，则往往是偶然的、随机的、茫然的历史，是难以追踪其意义和真理痕迹(trace)的历史。

对后来者而言，持续作用于现实、作用于当下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深刻的思想史事件的重要特质，端在其可以不断地被提出来加以重新检讨的复杂的问题性。它们提出了人类尚无法加以完满地解决的问题：对人类来说，这些问题太棘手，太顽固。人们对这些事件的阐释也是歧见迭出；之所以如此，乃在于人类自身的社会性分裂：在种种矛盾作用之下，人类将自己分裂为不同的种族、阶级、民族、国家等等。这些矛盾一天不转化，这些问题一天不解决，人类就会不断地重返那些相关历史的现场，重返那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域，从复杂的历史地层中考掘出事件的当代性。毋庸置疑，不同社会和阶级立场、不同文化和政治身份的人可能会从相同的历史事件中，考掘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当代性意义出来。

例如，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某些法国社会名流不断地提出要“清算五月风暴”，而当代理论巨擘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则大声疾呼要“忠诚于五月风暴的革命真理”。与此相类，尊孔或批儒也成为中国知识界裂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和思想史事件的意义似乎总是在不断地滑动之中。这就正如德勒兹所言，“事物的历史通常是占有事物的各种力的交替为了控制事物而相互斗争的各种力的并存。同一个事物，同一个现象，其意义根据占有它的力而变化。历史就是意义的变更……”(德勒兹《尼采与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第 4~5 页)对特定历史和思想史事件阐释的人越多，争论越激烈，就越能体现这些历史和事件中所蕴含的矛盾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也越能体现它们对于后来者的重要性。

考察思想史事件，不可避免地要考察思想史事件中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具有较高的曝光度和深刻的精神影响力的著名知识分子。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那些可见度不高，甚至是匿名的普通书写者，他们不是名流，不是精英，不是卓著的知识英雄，但他们与前者一起，共同见证和书写了历史。谈论德雷福斯事件，我们不会忘记著名的社会主义作家左拉；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最初的“公共知识分子”，左拉告诉我们，作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反抗一切不公和压迫(所以也要反抗资本主义剥削)。仔细考察德雷福斯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抗议对德雷福斯的不公判决上，左拉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抗议的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大约三千人在为德雷福斯上尉的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三千人之后，更站立着许许多多的大声疾呼者和籍籍无名的历史书写者。又如谈到法国五月风暴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冲在革命最前线的三大学生领袖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阿兰·热斯马尔(Alain Geismar)和雅克·索瓦若(Jacques Sauvageot)，也会想到他们背后的精神导师如居伊·德波、马尔库塞和毛泽东等响亮的名字，但是我们不应忘记，除此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的学生和市民，更有多达八百万的法国普通工人；他们团结起来，以其燎原之势，共同掀起了五月的红色革命风暴，从而引爆了一个时代。谁能说在五月风暴之中，林林总总的标语、海报、传单、书信、日记、地下报刊等等不是在书写思想，不是在书写历史？在书写历史尤其是书写思想史的时候，好的史家既能勾画出精英和知识英雄在历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更不会忘记着墨于普通民众的历史性

贡献。

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以思想史为唯一的历史,此说虽然受到不少批评,但赞同或同情柯氏此说的史家,恐怕也大有人在。即使对柯氏此说持批判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思想史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柯林伍德以降,西方思想史研究瓜瓞延绵、各说频出,呈现出一派繁花照眼、万木争荣的景象。重要的思想史研究形态,有以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为代表的“观念史派”,有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约翰·达恩(John Dunn)和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有以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学派”,有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德文 *Begriffsgeschichte*, 英文 *History of Concepts*)研究,有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和艾尔伯特·霍兰尼(Albert Hourani)等人的“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还有路易斯·梅南德(Louis Menand)和马丁·杰(Martin Jay)等人的偏重 20 世纪的现当代思想史研究,以及别有洞天的“书籍史”(History of Books)研究等等,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亦可以置于思想史研究的脉络之下。

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近些年来,西方的思想史研究风靡云蒸,成果迭出,蔚为壮观。其最有力的证明,是一大批思想史丛书的出版。现撮其要者,略述如下:1984年由思想史之“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斯金纳等人首编,现由大卫·阿米蒂奇、理查德·伯尔克(Richard Bourke)、珍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和约翰·罗伯森(John Robertson)接编的《语境中的观念》(*Ideas in Context*)丛书,已出到一百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新世纪出版的。“剑桥学派”之另外一个努力方向,是翻译和整理思想史原典,是为始于1988年、由斯金纳与雷蒙德·盖斯(Raymond Geuss)主编的“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丛书,该系列主要面向高校师生,致力于呈现自古希腊到20世纪早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核心文本,已出到一百余种,每年在全世界稳定销售超过五十万册。号称“愈三百年,专注学术出版”的荷兰博睿学术(Brill)出版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推出了重磅的思想史系列丛书,其中最主要的是她的《博睿思想史研究》丛书(*Brill's Studi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这套书自 1987 年始编, 现已出到两百多种(丛书现任总编是 Han van Ruler)。该丛书从第 146 卷开始, 在其下分设两个子系列, 一个是《博睿思想史文本与来源》系列(*Brill's Texts and Sourc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另一个则是《博睿艺术、艺术史和思想史研究》系列(*Brill's Studies on Art, Art Histo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此外, 博睿还连续出版另外数种思想史丛书, 比如《博睿基督教思想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博睿政治思想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等等。从博睿官方网站所列出的书目来看, 加上未被列进上述丛书的相关的单本书籍, 博睿出版社这些年已经出版的思想史书籍竟高达数千种!

在出版思想史丛书方面, 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出版大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亦未肯落于人后, 重点推出了数个思想史系列, 其中最重要的是她的《帕尔格雷夫文化史和思想史》系列(*Palgrave Studies in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2010 年以来已经推出 34 种。三位主编中, Anthony LaVopa 是著名启蒙运动研究教授, Javed Majeed 是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 Suzanne Marchand 则是研究德国的历史教授。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还连续出版《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国际思想史系列》(*Palgrave Macmilla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Series*), 关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相关研究, 由 David Long 和 Brian Schmidt 主编, 2003 年以来已经推出 19 种。此外, 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自 1963 年由 R. H. Popkin 和 Paul Dibon 始编, 现由 Sarah Hutton 接编的《国际思想史档案》多语种丛书(*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History of Ideas/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idées*), 也已出到了两百多卷。加拿大麦吉尔—王后大学出版社则有《麦吉尔—王后思想史研究》丛书(*McGill-Queen'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由 Philip J. Cercone 主编, 已出版六十余种。另外,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有《美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新研究》丛书(*New Studies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英国 Pickering & Chatto 出版公司有《启蒙世界: 漫长的 18 世纪之政治史和思想史》丛书(*The Enlightenment World: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出版社有《现代中东思想史和政治史》(*Moder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ry of the Middle East); 美国特韦恩出版社有《特韦恩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丛书(Twayne's Studies 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纽约大学出版社有《犹太社会和思想史重估》丛书(Reappraisals in Jewish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位于波士顿的学术研究出版社(Academic Studies Press)有《犹太思想史参考图书馆》丛书(Reference Library of Jewish Intellectual History); 甚至连联合国也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联合国思想史工程》丛书(United Nations Intellectual History Project Series)。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新世纪以来,与国外思想史研究和思想史系列图书出版之云蒸霞蔚、欣欣向荣相呼应,国内学界在思想史研究和思想史图书的出版上,也有着不凡的表现。表现之一,是复旦葛兆光教授的多卷本《中国思想史》在新世纪一版再版。中国思想史研究另外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则是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于2004年推出的厚达一千六百多页的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13年,汪晖教授更主要因这套煌煌大著与哈贝马斯同获意大利面向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奖项“帕西奥利奖”(Luca Pacioli Prize)。在向意大利学界推介该著时,威尼斯大学著名中国学家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教授认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一部“宏伟巨著”和“纪念碑式的作品”,该著“极具挑战性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对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并从亚洲视野——或更准确地说,从中国视野——观察整个世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以其思想的原创性和厚重的学术性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认可,不但意大利和日本已出节译本,哈佛大学出版社也要推出两卷英译本(第一卷已在2014年10月出版),韩国出版社更将出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的韩文全译本。在国外思想史图书的引进工作上,中国出版界在本世纪最重要的成绩之一,恐怕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从2003年开始,以原版影印的方式引进前述的“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4种),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欧洲思想史译丛》(5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思想史研究小丛书》(含译著1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艺术与思想史丛书》(含译著2种)和《社会思想译丛》(27种),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西方政治思想译丛》(8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全球史译丛》(4种)。以上思想史丛书的出版,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读者也可以看到,以上丛书的出版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性。比

如“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规模不小，已出80多种，但是毕竟是原文影印，一般英文程度有限的中国读者对此还是会望而却步的。其他丛书，除了北大出版社的《社会思想译丛》出书品种比较多之外，一般只有寥寥数种的样子，影响有限。《社会思想译丛》虽然种类稍多，但是涵盖面相对较窄，主要收录的是法学思想史著作。总体来说，上面这些丛书收录的多是专业性极强的思想史学术著作，处理的也多是20世纪之前尤其是前现代的思想史（重点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欧洲思想史），缺乏这方面知识背景的一般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难以接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有识之士有鉴于此，决定独辟蹊径，从近年来刊行的与西方思想史相关的浩瀚外文著述中，精心挑选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的作品，将其移译为中文，汇成《思想与社会译丛》。编辑同仁们在选取西文思想史著作之时，比较看重作品的“当代性”，看重其作用于当下、作用于现实的潜在性（potentiality）。读者也会发现，这套丛书讨论的多是从19世纪末直到21世纪的今天所发生的各种思想史理念、事件、人物和潮流。例如，入选本丛书的凡·戈斯的《反思新左派——一部阐释性的历史》，处理的是二战后美国新左派运动的渊源、兴起、发展和成就。与该书书名可能予人的暗示相反，作者戈斯并不认为新左派寿终正寝了。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作者总结说，新左派从未结束，它最大的成功，就是成为了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持续存在，新左派就永远具有顽强的“当代性”和现实针对性。

又如，本丛书收录的戴维·德雷克的《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从德雷福斯事件到德军占领期》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两书（丛书中将作为《法国知识分子史》上、下册合并出版），探讨的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永恒话题——知识分子的问题。虽然作者设定的写作起点是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但是两书的绝大篇幅都落在了20世纪，着力探讨上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和国际各重大事件中所秉持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所以也不妨说，德雷克的这两部著作，一方面书写的是法国20世纪的知识分子史，另一方面书写的也是法国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在两书中，德雷克既描绘了肇始于左拉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群像，也描绘了肇始于作为反德雷福斯派代表的莫里斯·巴雷斯的法国右翼知识分子群像。按照德雷克的叙述，法国既有左拉、罗曼·罗兰、路易·阿拉贡、萨特、

福柯、布迪厄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乏各色右翼知识分子，如反德雷福斯的右翼民族主义者莫里斯·巴雷斯、二战中投靠法西斯的贝当主义者（如罗贝尔·巴西拉奇、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莫拉斯）、冷战中的反共知识分子（如雷蒙·阿隆、安德烈·马尔罗、尤金·尤内斯库），以及叛变革命，自左而右，在七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新哲学家”们（*Nouveaux Philosophes*，如贝尔纳-亨利·莱维和安德烈·格鲁克斯曼）。从德雷克的书中我们可以见出，法国知识界在左右翼之间的摆动，始终贯穿着 20 世纪的法国思想史，也可以说，这种摆动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畅销书《萨科齐的意义》一书（2007 年法文版，2008 年英文版）中，当代大哲阿兰·巴迪欧告诉我们，与法国光荣的革命传统相伴随的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反动的第二种历史，“每一段革命时期都接着一个长期延续的黑色反动时期，而在这些令人痛苦的反动时期，掌握国家权力的领袖们从来都不缺乏大众和那些声誉卓著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每一次，都有很多知识分子在摇唇鼓舌，颂扬秩序的恢复，辱骂革命者们的‘恐怖行为’，……数不胜数”。（鞠振、王志超译文）从一定意义上说，20 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图景，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图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个体知识分子的思想呈现何种总体的面貌，端赖其在根本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上采取何种姿态和立场。

“改革开放”以来，在强调与国际接轨、经济形态迅速与西方趋同的大潮之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也呈现出杂花生树、纷繁迷离的面貌。举凡民族主义、虚无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保守主义、市场基旨主义、权威主义、国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想潮流，无不一一粉墨登场，往复论辩。20 世纪尤其是二战后西方思想界诸种潮流之间的风雷激荡，如今似乎也在中国一一上演。不夸张地说，神州各派思想之间的激烈论战和交锋，其复杂程度和烈度丝毫不让前者。这套《思想与社会译丛》的选目，按照编者的既定方针，也是有其现实针对性和社会意义的：从 19 世纪末以来的西方思想史所走过的历程，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或许能够取得一些经验，获得一些教训，得到一些启示，还有披荆斩棘、继续前行的动力。

书写总有立场的预设，书写总是立场的书写，世界上恐怕找不到所谓完全中立客观的历史书写。搜寻完全中立客观的书写，注定会是劳而无功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思想与社会译丛》的编者也不去做这种无谓

和徒劳的尝试。在选取西文思想史原著时，编者并不囿于一门一派的观点，而是抱持着“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态度，试图向中文读者最大限度地展示国外学界近些年来对 19 世纪末以降的思想史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最新学术成果。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将既能读到自由派学者理查德·沃林的《非理性的诱惑：知识分子对法西斯主义的迷恋——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又能读到市场基旨主义者爱德华·扬金斯的《资本主义与商品贸易：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还能读到新保守主义者穆雷·弗里德曼撰写的《新保守主义》（在该书绪论中，穆雷·弗里德曼坦承，“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历史都是传记”）。至于原著中可能存在的不当或错误表述，编者也没有进行删削，主持者相信读者的批判精神和辨识能力。

希望这套《思想与社会译丛》能在质量和数量上超越国内同侪，泽惠学林，成为中国的《语境中的观念》、《国际思想史档案》和《博睿思想史研究》丛书。

是为序。

蒋洪生

2015 年元旦 芙蓉里

目 录

序言 不止关乎 60 年代	(1)
第一章 定义新左派	(3)
新左派的成就：一个民主政体——如果我们加以保持	(4)
为什么会有新左派？新左派从哪里来？	(7)
激进改革、文化革命和反文化	(8)
第二章 50 年代的美国：“最好的世界”	(11)
冷战自由主义；政治——繁荣与共识	(12)
麦卡锡主义与红色恐怖	(14)
新左派潜在的根源：二战——一场社会革命	(17)
第三章 新左派在旧左派中的源起	(21)
黑人抵抗传统	(22)
共产党与进步左派	(25)
社会党和反斯大林左派	(27)
和平主义左派	(29)
第四章 黑人自由斗争：从“我们必将胜利”到“现在就要自由”	(32)
冷战时代的民权：蒙哥马利之路	(33)
小马丁·路德·金和新美国激进主义	(35)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与大众抗议之高涨	(38)
1963~1965 年：吉姆·克罗制度的垮台	(42)
黑人权力的源头	(47)
第五章 越战前对冷战的挑战：“禁止炸弹！公平对待古巴！”	(54)
拯救世界：新反核武器激进主义	(55)
古巴和第三世界革命的吸引力	(60)

第六章 北部学生运动：“言论自由”和“参与性民主”	(64)
反抗运动的孵化器：伯克利、麦迪逊和安阿伯	(66)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兴起	(69)
言论自由运动和伯克利的突破	(72)
第七章 地下女性主义者和同性爱者：“无名的问题”	(74)
反女性主义时代：女性主义的幸存	(76)
1960~1965年：新女性主义的出现	(78)
为异态者命名：同性恋在欧洲和美国的出现	(79)
1950~1965年：同性爱者对权利和尊重的要求	(80)
第八章 越战和“内战”	(85)
1954~1964年：缓步走向战争	(87)
1965~1966年：战争升级	(89)
1967~1968年：隧道的另一端仍是黑暗	(93)
军人、牧师和学生：从抗议到抵制	(97)
1969~1975年：越南化与两极化	(101)
第九章 黑人权力：“国中之国”	(110)
1965~1966年：反抗——黑人权力运动来了	(111)
1967~1968年：革命民族主义、文化革命和家规	(117)
1969~1976年：改革而不是革命：加里大会的决议	(122)
第十章 被红色、棕色和黄色权力“占据了的美国”	(129)
红色权力和印第安人运动	(133)
阿特兰的奇卡诺政权运动	(139)
亚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的运动	(145)
第十一章 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第二波：“个人即政治”	(151)
1965~1968年：全国妇女组织和平等权利女性主义	(153)
1965~1968年：激进女性的解放运动——给自己定义	(155)
1969~1974年：女性主义的爆发——向主流进军	(159)
独立自主：黑人女性主义和奇卡诺女性主义	(163)
永恒的革命和反革命	(168)
第十二章 同性恋解放：“走出私室，走向街道！”	(170)
左派与同性恋恐慌	(171)
1965~1968年：“石墙”之前：运动的酝酿	(173)

石墙暴动和同性恋解放的出现	(175)
政治转向：从“同性恋解放”到“同性恋权利”	(177)
女同性恋者和“女人的文化”	(183)
第十三章 胜利与失败：新左派带来的民主化进程	(186)
1968～1975 年：融入主流	(186)
激进化的自由主义	(189)
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193)
左派学院	(197)
新社会运动	(199)
“绿化美国”：反文化的意义	(200)
总述：新民主秩序的诞生	(207)